



重访深河桥：日军当年在此开始走向败亡

尖锐的防空警报在肃静的展厅中突然响起，令人惊悚。“这是当年日军轰炸时，同胞们听到的防空警报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深河桥抗战遗址陈列馆内，讲解员杨燕林讲述着贵州各族人民团结抗敌的历史。深河桥，这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古桥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也逐渐清晰。

独山县位于黔桂交界，是贵州南大门。抗战期间，独山县是贵阳、重庆的前沿战略重镇。深河桥地处独山县城北约9公里处，是一座古老的单孔石桥，始建于明隆庆年间。徐霞客在其游记中记载：“有洞自东谷走深崖中，两崖石壁甚逼，涧嵌其间甚深，架石梁其上，为深河桥。”

作为独山北部交通要道上唯一横跨深谷的桥梁，深河桥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1944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日军于当年4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至11月占领河南到广西的大片地

区。为防止中国军队南下广西，日军制造了进攻贵阳、重庆的假象。

1944年11月底，日军从广西兵分三路进犯贵州，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等县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掳掠，黔南人民遭受空前劫难，史称“黔南事变”。

杨燕林的外婆，是这场浩劫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外婆说，看到飞机飞过，听到炮声响起，老百姓就得躲到溶洞里。”杨燕林说，当日军离开后，老百姓们回到村子，看到来不及躲祸的同胞惨状，那是外婆一辈子的梦魇。“外婆每次说到这里，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大敌当前，中国军队竭力抵抗。原独山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李天和告诉记者，日军侵入独山县境内后，遭到中国军队层层阻击。黔南各族人民组成村寨护卫队，同仇敌忾。

黔南大地战事胶着，敌我双方各有伤亡。为阻止侵黔日军继续北进，也为中国军队继续布防争取时间，当局决定炸毁深河桥。“黔桂公路是由南向北、

过贵阳直达重庆的重要通道，深河桥是黔桂公路的重要桥梁，想要阻止日军，只能炸掉深河桥。”李天和说。

1944年12月2日下午，美军官弗兰克·亚瑟·格里森率领执行任务的美军一支小分队自广西来到深河桥。一声巨响中，深河桥被炸毁。

2008年，格里森曾重返独山，参与深河桥抗战陈列馆布馆的工作人员龙毓虎全程陪同。“格里森向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执行炸桥任务时，桥上还有大量难民在撤离，为了让更多难民过桥，炸桥任务延迟了5个小时。”龙毓虎告诉记者，由于独山县城有机场，飞虎队员在此驻扎数月，与当地群众感情深厚。“格里森老人很激动，这是他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宝贵回忆。”

随着深河桥的炸毁，日军没能北上，此后节节败退，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再无力发动大规模战役。李天和告诉记者，独山深河桥阻止了日军北上的步伐，成为侵黔日军不可逾越的鸿沟，也

是侵华日军走向失败的历史见证。“这就是‘北有卢沟桥，南有深河桥’。”

2020年，深河桥抗战遗址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23年，深河桥所在的麻万镇麻抹社区被纳入全省第三轮红色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麻抹社区党总支书记岑义学告诉记者，当地以“深河桥抗战文化遗址”为核心，将麻抹社区红色路线划分为“抗战文化研学区和乡村文化体验区”，着力打造特色小寨、宜居农房建设等多个示范点，发展红色旅游助力增收。

如今，被炸断的深河桥桥墩掩映在树林间，默默诉说着历史；一旁重建的深河桥，已是210国道上的重要桥梁。站在深河桥抗战遗址上远眺，G75兰海高速上的深河大桥与独山前往都匀的都独同城大道凌空飞架，横亘在青山绿水间……交通设施的沧桑巨变，见证着独山人民奔向幸福生活。

（据新华社）

烽火桃花山 今朝展新颜 ——石公华抗日根据地走访见闻



这是湖南省华容县东山镇桃花山上的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战地医院旧址。

新华社发

南挺进支队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1个连扩展到5个主力连，为新四军进军湖南敌后战场建立了坚实基础。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战争硝烟早已散去。今天，在这片曾燃烧革命烈火的革命老区，人们接续奋斗，书写着发展的新篇章。

走进桃花山脚下的华容县东山镇仙鹤寺村，成片皱皮柑果园映入眼帘。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水肥一体滴灌管道如脉络般在园中延展，林

下套种的大豆苗郁郁葱葱。

“2021年起，村里整合土地资源，建成了500多亩现代化果园。”仙鹤寺村党总支书记陈拥君介绍，“如今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多万元。”

目前，5000亩皱皮柑、3000亩高效蔬菜、1000亩红松菌及1000亩脐橙基地等现代农业板块，已在东山镇全域铺开，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发展的活力吸引着年轻力量的

回归，新老力量的接续为这片红色土地注入了不竭生机。“85后”青年刘洋正摩拳擦掌：“计划今年开直播，帮乡亲们卖皱皮柑！眼下嘛，先用短视频把知名度搞上去。”

凭借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与深厚的红色底蕴，桃花山周边的百姓巧做“红绿融合”大文章，开辟出文旅发展的崭新天地。

前不久，湖北石首桃花山旅游季在石首市桃花山镇桃源小镇启幕。这个集旅游度假、研学教育、亲子乐园、康养休闲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正成为革命老区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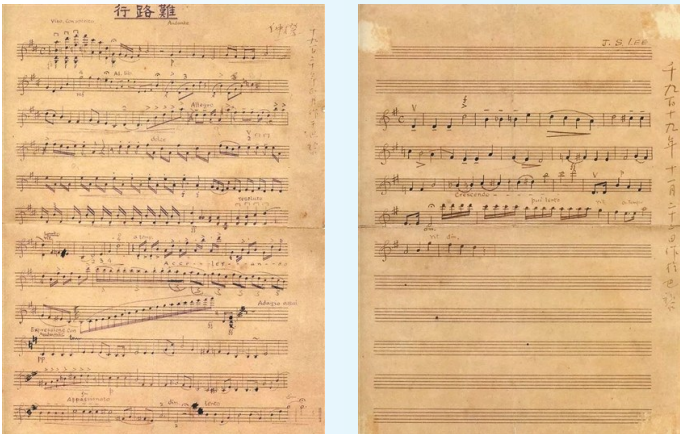
“镇里旅游发展得好，旺季时农庄每天能接待四五十桌客人！”桃花山镇古井口农庄老板刘崇宪说，村民们自家的皱皮柑、血红桃、桃花山土鸡等传统农产品，也成为游客眼中的“香饽饽”，经常被抢购一空。

如今，桃花山镇的发展契机吸引大批游子归巢创业。全镇从事民宿、农家乐、土特产销售的商户超300家，带动景区周边群众增收。2024年，全镇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000万元。

“在党的领导下，桃花山这片革命热土如今已发展成为文旅热土。”桃花山镇镇长赵辉的话语中充满自豪。

（据新华社）

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 竟然是李四光所作



李四光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曲谱。

李四光是著名的地质学家，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文艺青年”，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尤其爱好小提琴，中国现代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就是由他创作完成的。

1913年，李四光远渡重洋，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采矿系，2年后转入地质系深造。其间，他在旧货摊上买了一把小提琴，利用课余时间勤奋练习，休息日就去导师威尔士教授家即兴演奏，颇得他们一家的欣赏。1918年，李四光获得硕士学位后，在英国东部一座著名的锡矿山工作。1919年11月，他应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邀请，前往巴黎主讲“工业繁荣与能源开发”的学术报告。

在巴黎短暂停留时，李四光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上，即兴写了一段乐曲，共5行19小节，并写下自己的名字(J.S.Lee)、创作时间(22日)和地点(巴黎)。第二年年初，李四光有感于国内军阀混战，民生维艰，又在这张五线谱的背面，借李白的著名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以“行路难”为题，创作了一首完整的小提琴独奏曲，抒写了自己及当年一代知识分子即便明知前路坎坷，却依然渴望追求光明的心境，以及学成归去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和理想抱负。稿纸右上角题署“仲葵”（李四光的原名）二字，曲谱的右边则写下“一千九百二十年正月作于巴黎”等字样。

1920年秋，李四光拒绝海外高薪聘请，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不久，他把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的曲谱交给自己的好友、音乐家萧友梅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创始人），请他校正。

1990年3月，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专家陈聆群教授为编纂出版音乐教育家萧友梅文集，专程前往北京探访其侄女萧淑娟，了解到李四光当年交给萧友梅的曲谱，可能在后者的遗物中。回到上海后，陈聆群在一包学生的文稿中果然发现了李四光《行路难》曲谱的创作手稿（现藏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著名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之一陈钢，客观公允地指出，李四光的《行路难》全曲有头有尾，层次清晰，中间还有转调，并评价道：“最可贵的是乐曲的立意深邃，行路难，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个大概括。”

2001年，年逾七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一次名为《科学在中国》的文艺晚会上，演奏了李四光的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更感同身受地抒怀说：这首曲子告诉人们，探索科学道路是艰难的，但再难，科学工作者们也要走下去。（据《北京青年报》）

“开卷有益”的由来

宋太宗赵光义，十分喜欢读书。

当时书虽然很多，但版本杂乱、难以收集，即使皇宫里的书籍也不成系统，难以查检。于是，赵光义就命令宰相李昉把许多古籍的重要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成一部书。

李昉组织全国许多名家，编出了三部巨著：因为是在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年间完成的，所以书名叫《太平编类》《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其中，《太平编类》工程特别浩大，前后编了6年，全书共1000卷，搜集和摘录了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划归为55门，总字数约478万字，是我国古代富有学术价值的巨著之一。

这部书编好后，李昉献给赵光义过目。赵光义看得非常认真，每天一定要看三卷；如果因为事情忙，当天不能完成看书计划，那么第二天一定要补上。就这样，一年之内，赵光义终于把这部书看了一遍。因此，这部书又叫《太平御览》。当时有的大臣认为皇帝实在太辛苦了，便劝他少看一些，注意休息。赵光义说：“我生来喜爱读书，能从读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开卷有益嘛，哪里是白白地浪费精力呢！”对此，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文儒》中有记载，原文是：“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据《北方新报》）

古代公堂审案： 竹筒竹签的规制与功用

在古代州县衙门的公堂审案场景中，知县（俗称县太爷）的案几之上，常设四支规整的竹筒签筒，是古代基层司法理政的标志性器物。

四支签筒各题一字，合为执法严明四字。四支签筒各司其职、规制分明。题有“执”字的签筒，内置抓捕签，是县衙衙役执行拘传、抓捕、传唤涉案人员的法定凭证，掷出此签，衙役方可依规执行公务，是公堂司法程序的起始环节。其余三支签筒，分别盛放白头签、黑头签与红头签，三类竹签为刑责执行的核定凭证，对应不同的笞刑责罚标准：白头签单签责罚一板，黑头签单签责罚五板，红头签单签责罚十板，三者的责罚力度、行刑规范均有明确规制，绝非随意施刑的工具。民间流传的竹签施刑差异说法，多为演义夸张之辞，并非古代司法制度的正规规制。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支签筒的容积，恰好为古时标准一斗米的容量，单支竹签的长度，也精准契合古时一尺的标准度量。古时乡间市集交易，若因商贩缺少斤两、计量不公引发民事纠纷，民众争执至公堂评理时，知县便可直接以案上的签筒、竹签为标准度量器具，现场核算计量长短、容积多寡，快速厘清是非、公正裁断纠纷。

这套看似简易的竹筒竹签器物，实则是古代基层司法与民生治理相结合的智慧体现：对内以“执法严明”为信条，用标准化签筒规范司法流程、约束行刑尺度，坚守断案公允；对外以标准器物为凭，便捷调处民间民事纠纷，守护市井公平。

小小竹签竹筒，既承载着古代基层吏治的法治准则，也彰显着古人以公心断是非、以规矩定方圆的治理理念。（据《西安晚报》）



1939年冬，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撤出苏南东路地区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将留在东路的少量武装，交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与地方配合坚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为加强领导，新四军一批干部奉命返回东路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西撤时留在常熟地区养伤的刘飞、夏光等人取得联系，分析东路形势，制定

重建人民抗日武装的计划。11月6日，以隐蔽在阳澄湖畔的30余名伤病员为基础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在常熟唐市附近一个村庄成立。此后，新“江抗”相继进行了沈浜、陆家桥、华村等战斗，在日伪军据点间穿插袭击，令敌人寝食难安。

1940年4月，新四军第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奉命到苏南东路，负责统一指挥。下旬，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组建，谭震林任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5月，为了在这片河网密布的敌占腹地宣传抗战形势、增强军民必胜信心，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机关报《东进报》正式创刊。

《东进报》创刊时为油印小报，7日刊，每期仅印800余份。身处日伪顽三面夹击的水乡游击区，报社需频繁转移躲避敌“扫荡”，始终无固定驻地，常年以“水上办报”模式运转：白天，编辑人员分散在沿岸民房编辑、刻版、排字；印刷设备则装载船上，隐入芦苇荡深处。入夜后，印报船驶进僻静河浜，在摇晃的船舱内完成印

刷。这套特殊运作方式被根据地军民亲切称为“水上印刷厂”。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在各方力量支持下，报社人员克服困难，使《东进报》成功从油印升级为铅印，刊期缩短至3日刊，发行量大幅增加至5000余份，并细分出部队版和地方版。

部队版《东进报》紧扣苏南东路抗战大局，记录了战火中新“江抗”的成长轨迹。谭震林多次亲自为报纸撰写社论，为部队作战与根据地建设明确战略方向。此外，《东进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新“江抗”打击敌伪、开辟游击根据地地开展各项建设的实际情况。1941年元旦出版的新年号上，谭震林以化名“林俊”、新“江抗”副司令员何克希以化名“王嵩”联名刊发篇社论《一九四一年的斗争任务》，展现了东路军政委员会对新年度根据地建设的完整战略谋划；同期刊载的《“老虎”支队威震张家浜》一文，生动记录了新“江抗”第2支队在张家浜战斗中粉碎日伪进攻的机智与英勇。

皖南事变后，新“江抗”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东进报》随之调整为该旅机关报。部队版《东进报》专门刊发相关社论，回顾了新

“江抗”从弱到强的斗争发展史，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牺牲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深入团结、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部队“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大江以南的抗战主力，成为革命力量铁的前卫”。在这一新的战略目标指引下，第18旅投入巩固扩大东路抗日根据地、反日伪“清乡”的艰苦斗争，之后北渡江转战苏中，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中屡立功勋，成长为赫赫有名的常胜之师。

1941年5月，受江南社印刷厂遭敌袭击破坏的影响，《东进报》正式停刊。之后，该报改版更名为《前哨报》，成为苏中一分区机关报，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一直出版到1950年6月，总计发行515期。

这份诞生于苏南水乡抗日烽火中的报纸，在日伪顽夹击的艰苦环境下扎根群众、服务抗战，将党的抗战主张和前线捷报源源不断送到军民手中，为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发挥重要作用，其在敌后游击环境中摸索出的办报经验，在我党我军战时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据《中国国防报》）